

论《英格夫人》中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

郭晶晶

内容提要：《英格夫人》讲述了一个在民族责任和母子亲情中挣扎的“北方女英雄”因为错误的选择而造成民族和个人悲剧的故事。作品向观众和读者展示了母子亲情和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和选择，从而说明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舍弃亲情才是大爱，放弃个人恩怨和个人得失才是对个人利益的最好保护。

关键词：《英格夫人》；伦理困境；伦理选择

作者简介：郭晶晶，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Title: The Ethical Dilemma and Choices in *Lady Inger of Ostrat*

Abstract: *Lady Inger of Ostrat* tells the story of a Northern heroine who struggles between patriotic duty and maternal love.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this character and her tragedy brought about by her own wrong choices, the play shows to the audience and readers the conflicts between national interests and personal interests and thus warns us: at the critical moment when a nation is in danger, it is wise to abandon personal interests for the interests of our country.

Key words: *Lady Inger of Ostrat*; ethical dilemma; ethical choices

Author: Guo Jingjing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4, China). Her research areas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guojj@mail.hust.edu.cn

易卜生的早期戏剧和他的早期诗歌一样，“充满民族奋发精神与浪漫主义激情，幻想丰富、个性突出、冲突尖锐”（王忠祥 8），而《厄斯特罗特的英格夫人》（*Lady Inger of Ostrat*，简称《英格夫人》）就是其中的一部。该剧创作于 1854 年冬，1855 年春在卑尔根剧院首次演出。由于作家的创作技巧尚不圆熟，导致情节过于冗杂拖沓，因此戏剧在初次上映时并未获得观众和评论家的太多关注。然而，也正是这部未受关注的戏剧预示了一个天才剧作家的即将诞生¹。

《英格夫人》是一部五幕悲剧，讲述了一个在民族责任和母子亲情中挣扎的“北方女英雄”因为错误的选择而造成民族和个人悲剧的故事。该剧取材于挪威历史，但是剧作家并没有简单地再现历史，而是将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进行重写，把他们的故事与当时挪威争取民族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不仅表现了易卜生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与反对外来侵略的政治

热情，更寄托了作者深邃的伦理思考：每个人都兼具多重伦理身份，因此，当人们在人生中面临一些重要的选择时，基于不同伦理身份做出的不同选择往往会相互矛盾。而在民族危难的关键时刻，只有基于民族大义，根据自己的社会身份而非其他身份做出的选择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也只有将民族大义置于个人恩怨和个人得失之上，才是对个人利益的最好保护¹。

一、双重伦理身份

剧中的英格夫人出身于挪威高贵的罗迈尔家族，以厄斯特罗特为领地。就社会身份而言，她是厄斯特罗特领地的女领主。由于当时挪威许多受人尊重的老贵族先后死去，罗迈尔家族便成为反抗丹麦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而作为领主的英格夫人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以及对国家的忠心，被视为挪威人民的救星，承担着重要的民族责任。正如她的小女儿艾梨纳所言，挪威贵族和人民相信“上帝在你前额上盖了他的印章，选派你领导受压迫、自己无能为力的人民。骑士和贵族在宴会厅里对你歌功颂德，甚至各地的农民，不分远近，也把你当作国家的支柱，挪威的救星，大家都相信，由于你，幸福日子会重新出现！大家都相信，由于你，全国会出现一个光明的新时代”（221）²。她被认定是为国家“劈碎枷锁、恢复主权的人物”（231-232）。就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英格夫人的特殊地位而言，作为领主的英格夫人，被挪威人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她的责任就是带领挪威贵族和人民将挪威从丹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多年来，英格夫人确实是不负众望。身为女性，她具有超常的刚毅和果决，十年来“一直诚心诚意遵守着自己的诺言，把本国人的灾难困苦放在自己的肩膀上”（286）。除了国家的灾难和自己的责任之外，她不把任何事情放在心上，并因此在人民群众中建立起了极高的威信。挪威人民敬重她，把她“当作一位崇高伟大的妇人看待”（221）。

然而，领主仅仅是英格夫人的社会身份，一个人除了社会身份以外还兼具其它身份。就性别身份而言，英格是一个女人。作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她和别人一样有恋爱、结婚、生子的愿望。在克努特·阿尔夫孙的灵床旁边许下诺言后的十年中，英格夫人一直信守着自己的诺言，甚至放弃了作为一个正常女性的情感需求。在她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向她求婚，当时的她一心想到的是人民的灾难，自己肩负的民族责任，根本没把儿女情长放在心上，因此，当她的女友都为人妻、为人母的时候，她仍然独身一人。然而斯都吕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这个男人唤醒了 she 长期以来压抑着的对爱情的渴望，她的女人的性别身份因爱情而得到了强化，领主身份也因此而受到了淡化。和斯都吕伯爵在一起的那年的冬天她完全沉入爱河，享受着爱情的滋润，几乎忘却了自己作为领主的责任。英格夫人自己也承认自从认识斯都吕伯爵以后对于国家的事情她想得越来越少了。这一次恋情的结局是，在没有取得合法婚姻的情况下，她生下了一个私生子，从此具有了另外一个身份：母亲。

其实，生活在社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的身份都不可能是单一的，除了社会身

份外，还有在家庭中的身份。不同的身份要求人们履行不同的责任和义务。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履行这众多的责任时往往会遇到一些困惑和麻烦，尤其是在履行一种责任和履行另一种责任发生冲突时，麻烦就更大。作为领主，英格理当承担起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尤其是在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她应该团结挪威贵族、带领挪威农民共同抵御外来侵略；而作为母亲，她又担负着保护孩子的责任，特别是当自己的孩子被控制在他人之手，成为政治交易的一颗棋子，成为她履行民族责任的羁绊之时，母爱和民族责任就发生了激烈冲突。由于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以及英格夫人在其中所处的特殊地位，她面临的问题似乎更加突出。

二、伦理困惑和挣扎

“客观的伦理环境或历史环境是理解、阐释和评价文学的基础”（聂珍钊 14），所以英格夫人在处理双重伦理身份而带来的伦理责任时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是我们解读文本的关键所在。这出悲剧发生于 16 世纪的挪威，当时丹麦统治着挪威，同时又通过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领导控制着瑞典。但是瑞典人民一直都没有屈服于丹麦的统治，不断地进行反抗。以彼特首相为首的反对派一直都在暗中准备，等待机会发动起义。挪威国内的情况则比较复杂，反抗丹麦统治的挪威贵族几乎被斩尽杀绝，留下的也被迫离家出逃，流亡在荒山密林里。在挪威南部，很多贵族由于既得利益的驱使都拥护丹麦人，而在英格夫人所在的北方，挪威农民一直都有把丹麦人赶出去的愿望，并且一度在英格夫人的领导下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后来因为英格夫人的犹豫和退缩，又没有另外一个有势力和号召力的领袖起来领导，他们不得不苟延残喘于丹麦人的统治之下。

在这种背景下，英格夫人的特殊身份就使得她所处的地位变得十分重要。正如前文所示，英格夫人是厄斯特罗特的领主，曾经领导过挪威人民的反抗斗争，在挪威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信。因此，瑞典的反对派领袖彼特首相极力争取她的支持，鉴于英格夫人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威望，争取到英格夫人的支持无疑就争取到了挪威人民的支持，这样他们就可以联合起来推翻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领导，选取新的国王，从而摆脱丹麦对瑞典的控制。从这一点来讲，挪威人民和彼特首相领导的反对派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如果瑞典摆脱了丹麦的统治，就会大大削弱丹麦的势力，同时给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挪威人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从而处于摇摆状况的挪威贵族就会和挪威农民联合起来，共同推翻丹麦的统治。丹麦人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因此，英格夫人也成了丹麦人的拉拢对象。如果得到英格夫人的支持，他们对挪威的统治就非常稳固了。相反，如果英格夫人和彼特首相联合起来，不仅他们在瑞典的统治要遭到毁灭性打击，在挪威的统治也必定受到影响。因此，英格夫人成了三国政治博弈中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挪威和瑞典的利益是一致的。既然如此，英格夫人

的立场也应该十分清楚，她应该和彼特首相联手共同抵抗丹麦的统治，以实现当年的誓言。然而，英格夫人的儿子和他的特殊身份和处境把这个看似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化了。英格夫人和斯都吕伯爵的儿子是非婚生儿子，属于“私生子”。

“私生子”被看作是破坏伦理规则的产物，而“社会的伦理规则是伦理秩序的保障，一个人只要生活在这个社会里，就必然要受到伦理规则的制约，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聂珍钊 19）。为避免惩罚，“私生子”的身份常常被隐匿起来。该剧剧中，英格夫人的儿子尼尔·斯丹孙的身份也是这样处理的。

英格夫人与斯都吕伯爵有了私情并生下这个私生子，却又没有办法让他拥有正常的社会伦理身份，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为了隐瞒伦理犯罪，这个孩子被交给瑞典的彼得首相去抚养，从此他的身份被隐匿起来。这种母子分离给英格夫人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她整天为儿子担惊受怕，“他在生人手里受教养，我担心那些人也许会在心里种下堕落实苗。”（281）更为不幸的是，斯都吕伯爵死后，这个孩子被彼得首相所控制，成了政治交易中的一颗棋子。彼得首相利用这个孩子一直不断地对英格夫人施加压力，告诉她“哪一天你全心全意跟我们合伙，哪一天我就把你儿子送回挪威，早一天都办不到”（280）。在这种情况下，对儿子的牵挂使得她“心神不宁”、“整夜睡不着”，以至于“一天比一天消瘦”，“脸色越来越苍白”（210）。她每夜在宴会厅里来回走动，“低声哀诉”，“好像一个痛苦的鬼魂”（215）。

这个孩子给她造成的不仅是无尽的精神折磨，还有巨大的现实困扰，成了英格夫人一生的牵挂和履行国家职责的羁绊，让她失去了往日的理想和果敢，陷入伦理两难的境地，对儿子的牵挂使她挣扎于民族利益和个人得失之间。虽然丹麦人和彼特首相都想得到她的支持，但是站在两个敌对阵营的英格夫人的处境又是十分的尴尬和困难。一方面，丹麦和瑞典哪方面都想争取她，哪方面又不敢完全信任她。另一方面，为了既得利益她应该和丹麦人合作，而民族关系又让她和“反叛分子”结合在一起。无论是从国家利益来讲还是从儿子的安危来考虑，英格夫人似乎都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彼特首相的一边，支持挪威农民对丹麦人的反抗。可是在剧中她为什么总是反复无常，迟迟不愿行动呢？首先，作为母亲她深爱着自己的儿子，又因为儿子出生后的遭遇和目前的处境，她对儿子的感情更胜过一般母子之情。因此，英格夫人格外担心她的行为会将儿子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一旦她有所行动，而她的行动被国内支持丹麦人的南方贵族发觉，这些人会对她的儿子不利。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国内支持丹麦人的贵族知道有关她儿子的任何消息，她却始终担心着事情的暴露，从而给儿子带来伤害，乃至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如果他们发觉了我的秘密——喔，我知道！——为了剪断母亲的翅膀，他们会把对付克里斯替恩二世的手段——如果他不逃走的话——对付我儿子，结果他性命”（280）。其次，丹麦人也从未放松过对她的戒备，他们对她威胁利诱，逼她和他们合伙。虽然没有明证可以证明他们知道她有个儿子，但作为一个受良心折磨的敏感母亲，英格夫人在他们的言语中总是能感觉到某种暗示。所以，在尼尔·列凯提到她的儿子时她的反

应会是这样：“你知道这件事！你——你！那么他在什么地方？——你在哪里把他逮住的？你打算把他怎么样？（尖声喊叫）别杀他，尼尔·列凯！把他交还我！别杀我的孩子！”（278）从英格夫人的激烈反应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信息：她一直相信丹麦人知道她的秘密，而且他们会因为自己的关系而对她的儿子不利。对此，她这样坦言：“我对本国人抱着一片忠心；然而，我自己不能做主。有些事不得不瞒人，否则我就会遭受致命伤。然而只要让我在这方面一得到安全，你就可以看清楚我是不是忘了我在克努特阿尔夫孙灵床前发下的誓言。”（273）显然，这里需要瞒人的事情就是她的儿子，正是这个儿子成了她履行誓言、采取行动的障碍。

既然她对本国人抱着“一片忠心”，在需要她站出来领导反抗斗争的时候，她的无所作为就不能让她心安理得了。她曾经是一个带领挪威人民反抗丹麦统治的女英雄，她深知人民的期待，自己的责任。并且就她的性格而言，她绝对不愿屈服于任何人的控制，也不愿她的国家受制于丹麦。当她因为对儿子命运的担忧而不能履行民族义务的时候，她的内心是极度痛苦的，受道德感和民族感的折磨，她每天晚上像幽灵似的在宴会厅来回走动。“我身上压着这个诺言的重担，我的头发都花白了”（228）。她深知自己的责任，却无法履行自己的责任，在伦理两难的困惑中度日如年。因为不能履行曾经许下的诺言，在内心里她一直受到谴责，甚至不敢正视挂在墙上的先辈的画像，她“把克努特·阿尔夫孙的画像翻过去朝着墙”，因为“他的眼睛把她盯得太紧了！”（214）她以为这样就可以减轻良心的折磨，可是在她选择一己私利而牺牲国家利益的时候，她总感到“脸色惨白的灵魂——去世的祖先——阵亡的亲族。——啊，他们的眼睛从每个角落紧紧盯住她（我）！”（229）一方面，她担心儿子的命运，因为对儿子命运的顾忌，她不敢稍有闪失而让自己的敌人抓住了把柄；另一方面，她在犹豫、徘徊中深感良心的不安，不敢面对自己的祖先，不敢面对挪威人民，因为她知道他们都在看着她、在谴责她，她的责任感和她的良心让她生活在自责、惶恐和不安中。正是英格夫人所处的特殊伦理环境使她陷入伦理两难的境地，从而使一向办事果决的她在民族大义面前患得患失、犹豫不决，致使民族解放运动陷入瘫痪状态。

三、伦理选择及悲剧结局

在该剧中，英格夫人有过几次关键性的伦理选择，正是因为她在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过于考虑亲情，从而让自己背弃了领主的责任而做出错误的选择，最终成为“由利己而导致毁灭的典型代表”（煦佟 119）。

英格夫人的领主身份决定了她对国家和人民应付的责任。然而长久以来，儿子的安危一直困扰着英格夫人，影响着她的决定。自从儿子被交由别人抚养后，英格夫人没有一天的安宁，她每天都生活在担惊受怕、含羞忍辱之中。对孩子教育的担忧、对孩子安危的担忧无时无刻不在蚕食着母亲脆弱的心。在她犹豫、徘徊的时候，实际上她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是把儿子的安危置于民族利益之上，

只记得自己是个母亲而忘记了自己还是被寄予厚望的领主，忽视了作为领主应该承担的责任。她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个人的安危是难于保全的。在接下来的一系列选择中，她更是完全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一步一步地把剧情引向最后的结局。

在本剧开始的时候，英格夫人领地的农民和英格夫人的仆从得到消息，瑞典的达尔斯人民起义反抗古斯塔夫国王了，并且请求英格夫人发放兵器，批准假期，以便参加达尔斯人民的军队。这是个帮助瑞典人民解放自己的绝好时机，如果挪威贵族和农民同心协力、团结一心，他们就可以把丹麦统治者赶出挪威，这是英格夫人“最盼望的事情”（217），她也看出来这是最佳时机。所以在片刻迟疑之后，她答应了人民的请求，这让那些长期跟从她的人们感到她又回到了从前，又是他们曾经认识和信赖的英格夫人了。可是，尼尔·列凯的一封信却让她改变了主意。她深知国家的命运掌握在她手里，她有权力号召人民一起行动，而且他们也在等着她发号施令，而且这种机会一旦失去再也不会有了，这是国家命运的关键时刻！可是，她又犹豫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看她的说法：英格夫人认为在国内还没有团结一致的时候，“斗智”胜过“斗剑”，这是一种斗争策略，“可以争取一段喘气的时间”（223）。无论说法怎样，表明的意思只有一个：时机尚不成熟。事实上，英格夫人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只是拖延，而且拖延的结果是“为一个人，牺牲许多人”（229）。这里的一个人除了她的儿子还会是谁呢？“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处心积虑地救我的孩子”（291），孩子成为她一切行为的准则。虽然知道这样做有悖于祖先，有悖于挪威人民，她还是选择了为儿子的安危而牺牲大家的利益。正是她的拖延使起义错失良机，使挪威人民更加深陷于被统治的地位。

在儿子和“斯都吕小伯爵”之间进行选择是母爱和民族大义之间的又一次选择。保住了儿子就圆了英格夫人多年来母子相见的梦想，保住“斯都吕小伯爵”则留下民族独立的希望。而英格夫人这次错误的选择不仅造成了民族悲剧，也造成了错杀亲子的个人悲剧。

英格夫人的儿子尼尔斯·丹孙至始至终都是这出剧的关键人物。从他被带走的那一刻起，英格夫人再也没有见过他。他本来是彼特首相派到厄斯特罗特城堡会晤挪威贵族斯卡克达夫的使者，却误将敌国丹麦使臣尼尔·列凯当成自己应该会晤的人，并向他和盘托出自己的秘密使命，并把全部文件和信札拱手交给了尼尔·列凯，完全听命于尼尔·列凯，对英格夫人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冒充已死的尼尔·斯都吕，结果被英格夫人派人杀掉。

那么，尼尔·斯都吕又是谁？英格夫人为什么要杀死他呢？尼尔·斯都吕就是斯坦恩·斯都吕伯爵的儿子和合法继承人，现在的斯都吕伯爵。恰恰就在农民起义即将在达尔斯发起之前，斯都吕伯爵却突然去世了，这件事除了他母亲、彼特首相和府里几个老家人外，其他人一概不知。因为斯都吕伯爵是起义的集合中心，“如果他去世的消息一传播出去，人心就会涣散，事情就会完蛋”（263）。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个时候尼尔·斯丹孙出现在达尔斯，斯丹孙是

斯都吕伯爵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因为两人长得酷似，被达尔斯人民当成斯都吕受到了热烈欢迎。达尔斯的局势本来就不稳定，他一去，人民就公开起事了，而且还要推选他当瑞典国王。无意中，尼尔·斯丹孙促成了这场农民起义，而因为斯都吕伯爵在这次农民起义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他的影响力，不知底细的丹麦人正不惜代价派重兵四处追杀他。

如果的确如英格夫人知道的那样，眼前的这个人就是斯都吕伯爵，那么对于这么一个关键人物，作为谙熟政治之道的英格夫人，他的价值及对农民起义的意义她不会不知道，可她为什么还会让人杀了他呢？其中最明显、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斯都吕伯爵”的存在威胁到她的儿子尼尔·斯丹孙的性命，影响了他的命运。在尼尔·斯丹冒充的斯都吕伯爵带领的起义军被瑞典指挥官颜斯·别尔凯埋伏的军队击败后，他逃回到厄斯特罗特城堡，在瑞典指挥官即将冲进来抓“斯都吕伯爵”的时候，他决定“要买性命和自由，把事情全都告诉他”（301）。他本来是要把自己冒充斯都吕伯爵的事实告诉瑞典指挥官从而免去一死，而时时刻刻总在惦记着儿子的英格夫人却误以为“斯都吕伯爵”（尼尔·斯丹孙）要用出卖她儿子的秘密来挽救自己的性命，所以她要用一条命换一条命。所以，出于母亲保护儿子的本能她决定杀死“斯都吕伯爵”。

英格夫人杀死“斯都吕伯爵”固然就是为了确保儿子的安全，但其中另外一个因素也不容忽视，那就是列凯无意中说出的一句话：想当“国王母后”。如果说在儿子处于危难中，作母亲的唯一心思是想着如何把儿子救出来，“谁爱当国王谁当”，那么，在英格夫人确定儿子马上就要回到自己身边的时候，她的想法就不那么简单了。她不仅要保证儿子的安全，还要保证儿子的地位：“难道我儿子就不该跟那人一样承袭斯都吕家族的名位？”（292）她明明知道儿子能回到她身边是她多年的愿望，她该知足了，她也明明知道“当国王母后”的想法会引起上天的“发怒”，以至于“降灾殃”于她，被一己私利冲昏头脑的她却无法放下这个想法，她无视斯都吕伯爵对瑞典人民起义的意义及接下来对挪威独立运动的意义，做出了损害民族利益的事情，造成了错杀亲子的惨剧，同时也把农民起义的最后一点希望毁掉了，给民族独立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英格夫人悲剧的根源源于关键时刻错误的选择。母子亲情固然是世间最伟大、最无私的感情，值得尊重和理解。但是，作为一个人民寄予厚望的领导人，倘若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只顾惜母子亲情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甚至牺牲国家利益来保护母子亲情，不仅是不明智的举动，甚至是可耻的行为。正如剧中的英格夫人，假如在一开始从民族利益出发她就和彼特首相合作，无论起义成功与否，她都会被载入史册，被挪威人民永远铭记，同时，很有可能她深爱的儿子也早已回到她的身边；假如在她面对挪威农民参加瑞典起义的要求时，把儿子的安危以及把和列凯之间的个人恩怨稍稍放一下，可能后面的故事就要重写；假如在她动手杀死“斯都吕小伯爵”之前，稍稍念及另外一个母亲的失子之痛，念及一下“斯都吕小伯爵”之死给起义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那么无论是什么样的理由都无法让她举起屠刀，儿子的性命虽然堪忧，但至少不至

于落个错杀亲子的下场。可是，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所以才有“一失足而成千古恨”这样的至理名言。英格夫人的时代虽已过去，但该剧仍然是一记警钟，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注解【Notes】

1. Archer, William. "Introduction." *The Works of Henrik Ibsen*.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1.
2. 本文中所有《英格夫人》的引文均出自潘家洵等译《易卜生文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 年版，以下引文只标出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引用作品【Words Cited】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与术语”，《外国文学研究》1（2010）：12-22。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Its Fundamentals and Terms.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2010): 12-22.]
- 煦佟：“精神反叛的先声——读《易卜生全集》第一卷”。《外国文学研究》3（1987）：117-20。
[Xu Tong. "The Harbinger of Spirit Rebellion—Reading *The Collected Words of Ibsen* Vol. 1".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3 (1987): 117-20.]
- 易卜生：《易卜生文集》（第一卷），潘家洵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年。
[Ibsen, Henrik. *The Collected Words of Ibsen* Vol. 1. Trans. Pan Jiaxun & etc.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ress, 1995.]

责任编辑：李 纲